

热门话题丛书

热门话题丛书

女人的出路



图书馆

热门话题丛书

女人的出路

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妇女

李小江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年·沈阳

“热门话题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路 李长工 李春林 陈志强
袁闰琨 陶 钊 章一德 梁刚建

女人的出路

Nüren de Chulu

李小江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0,000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 1/2
印数: 1—18,691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可可

版式设计: 李 夏

封面设计: 李勤学

责任校对: 王继斌

ISBN 7-205-00917-0/C·79

定价: 1.70元

“热门话题丛书”出版前言

物价、工资、住房、党风、教育、知识分子待遇……这一系列在改革中产生而又关系到改革的成败，维系着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当今已无可回避地摆到人们面前，自然为人们所关注。因而这些问题成为“热门话题”，成为人们在公众场合，在电视、报纸、广播、刊物、书籍中谈论的“热门话题”，就不足为怪了。

话题而成为“热门”是一件好事。它说明群众对一些社会现象敢于议论了，对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了，对某些腐败、丑恶现象敢于抨击了。这正是社会“透明度”的具体体现，是群众主体意识的表现，是群众参政、议政、参与改革、参与社会的热情的显示。这也是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落后走向进步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机勃勃、兴旺昌盛的标志。

“热门话题丛书”就是在这一新形势下应运而生。它试图选取当前社会上群众最关心的问

题，来同群众一起议论，秉笔直言，使本书能同群众的心贴在一起。所论问题，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由现象到本质的剖析与透视，既从宏观上反映在新旧体制交替和碰撞中的社会心态，又引导群众的观念变革，在改革的大潮中树立新观念，确定新的价值取向。读者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取舍，可以从中获得新的认识，而不致在众说纷纭中无所适从，莫衷一是。

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从事报告文学和纪实专访的新闻记者。他们在平时广泛接触社会生活，接触群众，因而能迅速反映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并用敏锐的目光予以审视，且有翔实生动的材料和事例为其铺垫。作者以与读者平等的身份与读者一起摆事实，谈现象，发议论，娓娓道来，寓论理于叙事之中，相信读者能易于接受并引起共鸣。

利用图书这一形式，迅速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迅速反映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这种尝试尚须读者予以鉴定。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常出常新，成为广大群众的良师益友，在改革开放中发挥舆论作用，推进改革事业的前进。

“热门话题丛书”编委会

1988年7月

目 录

“热门话题丛书”出版前言	
引 子	1
第一章 改革的压力	5
第二章 究竟是什么问题	12
问题一 大邱庄妇女回家	13
问题二 “黎静们”的息工待业	18
问题三 女大学生分配	24
问题四 妇女参政危机	28
问题五 妇女组织改革	37
第三章 寻根索源	51
理论问题一 妇女解放的性质	51
理论问题二 中国妇女解放的特点	55
第四章 出路	65
理论问题三 妇女解放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67
第五章 认识我们自己	75
总体状况	79
农村妇女	81
城镇女工	89

知识妇女	97
第六章 再谈“出路”	110
理论问题四 当代中国妇女解放的 基本任务	110

附

1. 怎样看待当前妇女问题和妇女研究	123
2. 妇女研究在中国	135

引 子

为什么要谈“女人的出路”？

我们曾几何时为女人的出路忧虑！追溯千年华夏长史，女人的天职是生儿育女持家侍夫，出嫁成婚是女人的出路也是女人的归宿。

回眸30余年岁月，新中国的诞生也是女人的新生。中国妇女在男女平等的法律庇护下走上社会，“男人能办到的，女人也能办到”，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女人的出路。

可是——

1988年伊始，《中国妇女》杂志抛出了触目的讨论：1988——女人的出路？

这场在编辑部内部酝酿了半年之久的讨论，于新年伊始出台，绝非编辑们的一厢情愿。它在党的十三大之后抛出，是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而来。它骚动了社会情绪，是因为首先敏感地承受并正视了改革对女界的骚动。

继之，中央电视台、电台、诸多报纸哄然而起，“女人的出路”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已经深入人心的是，中国的出路在改革，社会发展的出路也在改革。可为什么改革中偏偏首当其冲地突出了“女人的出路”问题？难道社会的出路与女人的出路相左？

随着改革日益深化拓展，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到1988年底，人们已日感道路维艰、步履蹒跚。这种形势下，与年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女人呼吁解放的声音日渐谄哑了；抑或是女人真正融于改革，已经消除了寻找“出路”的忧患？

在我国，志士仁人中一向有摆问题发牢骚的优良传统。而今，柏杨之风吹遍大陆，国民性与社会问题丑陋化也成为时髦。如此古风新潮中，有关女人的问题陡然多了几分色彩。上层、下层、学界、民间，到处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议论：中国改革形势险峻如烈马临崖，社会已自顾不暇，还傻谈什么妇女解放？中国女人的问题也植根于国民劣根性中，国民不醒，哪里有女人的出路？

当前中国妇女问题，究竟是如“热门话题”所云，已成社会忧患；还是深化改革之必然，根本不成其问题？

要想对此做出清醒的回答，发牢骚不行，挖掘国民劣根也无济于事。我们生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这样一个多磨难的国度，即便是精神

到了“阳春白雪”的境界，两条腿仍然深深地埋在血污的泥土中——我们是这块土地的造物。面对这种现实，理性的目光只能直面现实并穿透现实，它的指令：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我们的“罗陀斯”，就是当代中国国情。而中国妇女研究的“罗陀斯”，就是当代中国国情下的中国妇女。

中国妇女原是无需忧虑“出路”问题的。毛泽东同志将中国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胜利融于一体的伟大预言，在1949年以后曾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的伟大实践，正是这一“伟大预言”，隐含着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具体国情和中国妇女运动不同于西方女权运动的特殊经历：

50年代，正当西方世界为平复战争创伤，男人重返职业女人重返家庭，造成两性角色重新裂变时，中国妇女却大批走上社会，参加生产劳动，在男女平等的法律保障下走进一个原是男人一统天下的世界。

60年代以后，当西方妇女在女性角色复归的压抑中重新觉醒，重新树起女权主义大旗的时候，中国全社会正经历着空前的浩劫：它裹挟着所有的人，也裹挟着融于社会的中国妇女。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政治运动，也无论是城市的、农

村的、有知识的，还是文盲，女人未能因身为女性幸免于难——这是她们的灾难，也是她们的骄傲。

30多年来，中国妇女走过了这样一条路：尽管中国贫穷落后，她却在这个国度中分享了和男子一样的社会权利，承受了和男子一样的社会苦难——因国家的贫穷和落后，也因她对社会认同的自觉和深切，她实际承受的苦难较之中国男人的更加沉重。

然而，为什么在今天，在社会呼吁改革寻求发展的今天，首当其冲地将妇女抛出？在劳动市场上，在竞争机制中，每每有女人及女人的问题作梗。女人的问题同化于“公平效益”，处处与社会急切张扬的“经济效益”对抗。一时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或清清楚楚或隐隐约约，但却已经普遍感到：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似乎与中国妇女的利益相背。

果然如此吗？

理性的回答总是“一致”——理论界、女界不是试图借用新闻媒介说服社会说服广大妇女吗？而现实的反馈却是“冲突”！这种冲突在眼下的改革中日益尖锐了，使得理论界、女界甚至新闻界也不得不默然缄口。

第一章 改革的压力

其实，改革对妇女的压力早已存在多年了。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包产到户，中小企业承包制的推广；随着乡镇商品经济活跃，第三产业崛起，个体阶层形成；随着经济效益对公平原则的逐步蚕食，新的妇女问题（相对解放30多年而言）已如春笋，在改革的微风细雨中纷纷萌发。如妇女回家、女工减薪待业、女童失学和卖淫纳妾问题的重现，早已不是在今天，而是有了近10年的历史。起初，这些问题多发生在乡镇和基层，又因理论界新闻界长期对此缄口不谈，我们便可以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地游刃于改革大潮，将经济收入用作检验妇女解放的尺度，用经济上升指数涵盖妇女问题——这不是臆测，而是事实。

1987年以前，也许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动因，也许是社会良知出于对改革的保护，新闻界对改

革中出现的问题报道甚少。有关妇女的报道也是这样，诸如“回家”、“卖淫”一类象征着旧社会的惹人犯忌的字眼，在各类大报上是罕见的。

1986年6月，陕西省妇联和陕西省社会学研究所联合召开题为“改革与妇女”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地注意到改革对妇女的压力，也提出了大邱庄典型和妇女回家问题。许多妇联干部忧心忡忡，带着“改革使农村妇女经济收入大为改观”的诸多数字、文章和现实生活中日渐纷多却难以诉说的妇女问题参加会议，期待这种矛盾心境能在会议上有所缓解。我们的妇女干部早已习惯了下情上传、上情下达的工作模式，期待全国妇联和理论界对现实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解释，并拿出现实可行的措施，以应付正在变化的社会和妇女。遗憾的是，面对这些敏感的问题，却偏偏是部分社会学学者不愿正视改革对妇女的冲击，权威性地用经济指数的增长去安抚已经生出危机感的妇联干部。

继之而来的，是1987年理论界及妇女理论的沉寂。改革是进是退？似乎取决于一场严峻的政治较量。中国人是惯于拭目以待的。理论界现出粉碎“四人帮”后空前的冷清。女界尤恐不过。或许是因为受封建传统压迫最甚，一旦反右，女界总是较社会各界更自觉更彻底。政治压力之下，话是可以不说的，问题也可以不再提出。中

国学界的机敏，特别表现在绝少不识时务地骚动政治情绪。但是，历史的进程是不会停滞的，诸多新的问题，一直在已经开始的改革方向上我行我素地发展，妇女问题亦然。于是：

——已经获得自主权的部分承包企业实行了有关妇女的改革：一些妇女息工回家，女职工福利取消或减少，部分妇女拿着一定百分比的工资待业了……女大学生分配也面临挑战：不是因为能力而仅仅因为她们是要生孩子的女人！

党的十三大以后，改革已成定局，政治气氛也相应宽松。尽管接踵面来的竞争强度和快节奏对全社会各阶层都有压力，大多数人还是能较为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已经和正在给社会和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出路。在这种形势下，作为社会群体普遍感到压力而又普遍感到出路渺茫的主要是女性；而作为女性群体形式的组织代表妇联，也同时感到自身生存的危机。

这是为什么？

首先，我们要向自己提问：在改革大潮中，社会倡导什么？冲击什么？它究竟荡涤着什么？强化了什么？

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已经讲得明白，所谓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

革：它倡导的是提高经济效益，以尽快实现我国从贫穷到小康到富裕的转化，它冲击着政体中的官僚主义、理论界的教条主义、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每个人的惰性；它主张求实精神和实力竞争，这是多年来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它也冲击着女人！在求实精神面前，我们不能不正视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生理问题和生育问题，在实力竞争中，妇女素质普遍偏低和双重角色性质，显然于女人及包容女人的企业竞争不利。

还有，改革荡涤着干部终生制和企业大锅饭。正是在废除终生制、砸碎大锅饭、实行聘任制和合同制的同时，许多妇女的劳动保护和福利逐一被荡涤着。随之而来的，将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和“男女晋升差距”问题。

1988年以来，一系列妇女问题的确是更加突出更加触目了。触及的不仅是女人，还有与女人利益相关，朝夕相处的千千万万个男人和有妻子有女儿的万万千千个家庭。年初，我们曾经就一年的自然进程做过一个大概的“问题”预算：

第一季度，伴随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七届人大的召开，在略有民主气氛的差额选举中，许多女干部落选，突出了妇女参政问题。

《中国妇女》杂志在1988年第2期刊出“中国女性参政问题”。《中国妇女报》开辟了长达十期的“妇女参政问题对话”。讨论是可以以

“结束语”告一段落的，“问题”本身却依然故我，仅仅是一个开始。

第二季度，在落实企业自主权和实行聘任制、合同制的同时，妇女的社会福利、待遇、晋升普遍面临挑战。特别是妇女就业问题，在深化改革中将进一步突出，编余女工将大幅度增加。

1988年3月8日前夕，在历年高歌妇女解放的最佳时期，河南电视台抛出5集电视片“改革，冲击着女人”，又一次将妇女就业和双重角色问题提交社会论坛。中央电视台“热门话题”节目中，仅一个“妇女要不要回家”就引来社会各界关注，其“热”的程度似乎是与“住房改革”、“物价问题”不相上下的。

第三季度，在一年一度的大学毕业分配和高考招生中，女大学生分配和落榜女青年就业难的问题重新提出，中央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在女大学生分配问题上联合做了专题报道。《中国妇女报》等诸多报刊杂志记者深入学校基层，调查采访，及时报道了女大学生心态：忧患和茫然是普遍存在的。

第四季度，随着企业竞争机制的强化和“满负荷工作法”的扩大实施，企业活力的增加与职业妇女双重角色紧张成正比。“同工同酬”在实际工作中的调整（浮动工资和奖金），以及女工

生育后重返职业时的双重劣势（熟悉岗位技术和家务育儿负担），都将使妇女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许，在这些挑战面前，正是部分妇女自己不得不选择回家，人们会说，这不是社会的意志而是妇女的自觉选择。

以上只是“帐面”上能明显看到且又能够冠冕堂皇面诸公众舆论的问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女界正在和将要承受的压力以及新闻界热忱呼吁社会重视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不被人们看作问题，它似乎仅仅造成女界自身的恐慌。即使是那些能以局外人身分申述“解放妇女”的开明士绅，一旦卷入事态，成为企业家或决策人，便从此对“妇女问题”敬而远之了。女企业家对女性的态度也少有例外。显然，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某个人的不良或良好意愿，也不单纯是某种政策的偏狭或完善，而是一种不遂人意的客观力量作祟。

面对这种现象，评议社会是否公正完全无济于事。公正的天平从来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对此，只要我们愿意面对现实，就不能不看到：眼下这许多妇女问题的出现，恰恰是社会用以缓解改革中正在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如劳动力市场过剩、劳动强度增加等等）的手段——社会生产力在突击发展阶段总是将妇女作奠基石，